

参考资料

# 德国快讯

2020 年第 11 期 · 总第 755 期

---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 本期内容

特朗普欲借大幅削减驻德美军施压默克尔，德美关系现状“十分复杂”

从大众集团思考新冠疫情下的中德经济合作和全球化

默克尔会打开欧洲从联盟走向联邦之门吗？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0 年 5 月 25 日~6 月 10 日）

## 特朗普欲借大幅削减驻德美军施压默克尔，德美关系现状“十分复杂”

《华尔街日报》5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大规模削减美国在德国的驻军人数。德国外长马斯近日接受德国《星期日图片报》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部分驻军要撤离，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是跨大西洋联盟的亲密伙伴。但是这个关系十分复杂。”马斯同时提醒美国，从在德国驻军中获益的不仅仅有德国，也有美国自己：“我们十分珍视和美国军队几十年来形成的成熟合作，这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

媒体没有放过其中的一个重要细节，即德国政府并没有第一时间从官方渠道获得这一消息，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也说自己是在媒体上听说美国政府有此计划。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德美之间的关系现状。如果一个外交官使用“十分复杂”来形容两国关系，这种关系恐怕离“意见严重分歧”已经不远了。

### 美国撤军让两国关系触到历史低点

8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正式通知德国驻美国使馆：美国从德国撤军的计划属实。美国和德国是北约盟国，驻德美军超过3.4万人，是美国在海外的最大规模驻军，甚至多于日本和韩国。此外，驻德美军还雇用了1.7万名美国人和1.2万名德国人。

如果按照目前的消息，特朗普计划将在德国的驻军人数降到2.5万人，那就意味着美国及北约的军事力量的空间分布以及战略重点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重组，而德国作为美国的盟国，对这一变化一无所知，美国也不认为有征求德国意见的必要，德国仅有被告知、必须接受的义务。这无论如何都不像一个冷战后世界最大规模的军事集团的战略调整行为，以及一个团结的军事同盟内部盟友之间应有的交流方式。

美国从德国撤军的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撤军首先表明北约的战略调整，但是由于撤军的决定来得突然，所以这种战略调整的不确定性令人不安，如果驻军调往东欧其他国家，势必引起俄罗斯的强烈反应，引发欧洲整体安全形势的变化；其次，把欧洲驻军从德国撤向别处，说明德国对于（美国眼中的）北约而言重要性下降；第三，缺少了美军的保护，德国自身的安保压力必然增大；第四，美国在德国驻军多年，围绕着美军基地已经形成了多处地域性的基础设施、经济和就业圈，美军一旦撤离，对于所在地的经济也是不小的打击。

不过，这一切对于德国安全的伤害并没有达到伤筋动骨的程度，真正的伤害是象征意义上的：目前的德美关系已经触到了两国历史上少有的低点，可能只有施罗德政府拒绝参加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而受到后者的冷淡才能相比。

## 特朗普在发泄对德国的不满

美国政府的撤军决定在德国政界引起了从失望到挖苦的各种情绪。联合执政的联盟党和社民党阵营对此持审慎态度。社民党联邦议院党团主席明策尼西认为这种大规模的撤军是一种“转折”，一方面在德美军的行动能力将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迫使德国人调整安全政策的着眼点，即立足于欧洲的力量。

德国政界认为，特朗普在发泄自己对于德国的不满。这种不满，其实早已有迹可循。

点燃特朗普直接怒火的，可能是默克尔总理宣布不出席特朗普提议在美国举行的 G7 峰会。在默克尔拒绝出席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了“欧洲的统一”以及默克尔的不可或缺。特朗普在默克尔宣布不出席峰会之后，提出“G7 的形式已经过时”，希望邀请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加入以壮大阵容，这一建议又被德国和法国拒绝。连续遭到重要盟友的冷脸，对特朗普来说，既对他个人威信是一种打击，也显示了美国已经无力为曾经的价值观同盟设定议程。按照这种分析，特朗普马上以撤军为手段给德国一个教训，倒也符合他的个人风格。

由此看来，两国关系的不睦也体现为两国领导人关系不佳。默克尔与特朗普无论是执政风格、个性还是价值理念均无甚交集。从默克尔在特朗普上任伊始提醒他遵守“共同价值”开始，两人就给外界留下了不睦的印象，2018 年加拿大 G7 峰会上两人“对峙”的照片更是传遍全球媒体。上周，默克尔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对“您信任特朗普吗？”这个问题选择了一个冷峻的答案：“我和全世界的当选总统合作，所以也和美国总统合作。”

对于特朗普对于非洲裔美国人弗洛伊德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事件的处理方式，默克尔也无法认同，“我的政治诉求始终是寻求合作和和解”，而美国总统的执政风格则“非常有争议性”。

## 特朗普对德打出施压“组合拳”

德国与美国现政府“道不同”非自今日始。在国内政治上，特朗普把个人利益置于政党和国家利益之上，不惜利用分裂美国社会作为政治手段；在国际政治上，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的“美国优先”路线，对于在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规则以及由之产生的国际义务弃若敝屣，陆续退出多个国际协议和组织。这促使默克尔在 2017 年意大利 G7 峰会之后就发出呼吁：欧洲人不能再指望美国的保护，而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美国以撤军作为对德国的施压手段，是完全符合其自身的逻辑的。特朗普不再把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向盟友提供安全保障视为理所当然，他认为美国的付出过多，而德国却一边长期享受美国的保护伞，一边从美国赚取大量的贸易顺差。

特朗普的心腹、刚刚卸任的驻德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在 2019 年夏天就已经发出了撤军的威胁——德国要按照美国的要求把防务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这种令德国人吃惊的口吻使得格雷纳尔成为德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美国大使。据《明镜周刊》的报道，提前结束任期的格雷纳尔正是特朗普从德国撤军决定的推手。

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即使对盟友也不惜使出政治、经济和军事施压的“组合拳”，以实现美国的利益诉求。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涉及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北溪 2 号”天然气管道。由于绕过东欧国家的俄罗斯能源西输路线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去年 12 月，特朗普签署 2020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宣布制裁参与“北溪 2 号”建设的企业。6 月 4 日，美国参议院一个两党组成的小组提出更为严苛的议案，欲有追溯力地制裁一切参与“北溪 2 号”和“土耳其溪”的企业，从提供保险到提供设备和技术，连“铺石块”的行为都在制裁之列。美国丝毫不理会从施罗德到默克尔政府一再强调的能源安全诉求，执意彻底阻止“北溪 2 号”建设成功和投入使用。

尽管德美关系现状处于历史低点，但也无须过度诠释。德国对美国的态度有一个特点，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人对于美国总统个人的看法。这在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对于这三位美国总统个人评价的不同，导致德国人对于美国的评价及德美关系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变化。如果特朗普在今年 11 月美国大选中败给民主党候选人拜登，那必然意味着德美关系会迅速回暖。现在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近半年时间，按照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一切皆有可能。

## 从大众集团思考新冠疫情下的中德经济合作和全球化

大众集团在 5 月底为德国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打了一针强心剂。5 月下旬先是市场上传闻大众即将在中国市场上有大动作：收购一个领先的汽车动力电池厂家的股份，同时加强电动汽车的投入。5 月 29 日，大众集团总裁赫伯特·迪斯（Herbert Diess）宣布，“大众将与强大和可靠的伙伴一起扩大在中国的电动汽车攻势。”具体的措施包括三个步骤：首先，大众中国将出资 10 亿欧元，获得此前由安徽省国资委全资控股的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0% 的股份；其次，大众中国把此前与江淮汽车合资成立的江淮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股份从 50% 增至 75%，这意味着大众获得合资公司管理权；第三，与之配套，大众中国投资以合肥为基地的动力电池制造商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将以约 11 亿欧元获得国轩高科 26.47% 的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如果这一系列步骤得以落实，大众集团将在中国市场、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市场上布局更为全面。

在全球经济处处因为新冠疫情而陷入衰退危机之际，德国大众汽车这一笔高达 20 多亿欧元

的投资，给国内外观察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很显然，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不可能是突然作出增资中国的决定，而从今年突发的新冠疫情也没有阻止大众集团这一战略性的步伐。而且，大众集团此次投资的三个步骤介入中国经济的三个板块，即深度介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江淮汽车）、在中国汽车合资股比开放后增资持股（江淮大众）和布局中国民营企业（国轩高科），如果不是深耕中国、了解中国、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能力与前景，甚至视中国市场与能力为自身企业转型的机遇，大众集团想必是不会作出这一决定的。

德国的世界级企业以行动回应了“与中国经济脱钩论”和“外资撤离中国论”。在新冠疫情爆发的上半场，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传导至一些全球合作的产业链，于是一些国家出现了“降低对中国经济依赖性”的观点，进而有人鼓吹把产业链撤出中国，类似的观点也影响了中国国内。有道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脱钩论”“撤资论”等观点多来自政界，间或也得到金融界的声音附和，却鲜有发自实体经济的掌门人。而现实的情况是，在新冠疫情的下半场，已经率先恢复的中国经济很可能可以帮助某些国家尽快走出危机。大众集团给“脱钩论”“撤资论”的吹鼓手们上了一堂实体经济的基础课：中国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巨大市场（已经不是待培育市场）、不断提高的研发能力、熟练的产业工人和合理的劳动力价格的集合体。如果仅仅因为劳动力价格因素离开中国，那么说明这家企业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逻辑和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如果不是因为市场经济的逻辑，而是因为政治、意识形态或者担心过度依赖中国等原因离开中国，那么这家企业必须要考虑撤资的经济账：从中国撤资的成本，到本国或者第三国重新投资的成本，放弃中国市场，放弃中国的产业链，在本国或第三国投资的风险，等等。不知道在全球疫情深不见底、中国却加速复产、而且很有可能在今年仍旧实现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有哪家企业、哪个金融投资者、哪个政府会为这份从中国撤资的经济账买单？

可能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受制于“保持社交距离”的政界人士只能不停地说话、制造话语以维持存在感。只不过，无需任何成本的信口开河是一回事，但是违背了经济和市场规律——经济活动被政治化也是违背规律——则是另一回事。这里还有第二个产业链回流的例子，不妨供疫情下“脱钩论”“撤资论”的吹鼓手们学习和思考。

这个例子涉及的是德国运动产品巨头阿迪达斯。2017年，阿迪达斯宣布可以利用3D打印技术按照顾客的个性化需求打印高端运动鞋“Futurecraft 4D”。在理想化的方案中，3D打印技术的投入意味着无须考虑劳动力成本，而个性化的高科技产品也代表了未来的市场趋势，所以更贴近顾客和市场成为竞争的要素。因此阿迪达斯宣布在德国安斯巴赫（Ansbach）和美国的亚特兰大两地各建一座全自动化的所谓“快速工厂”（Speedfactory），不仅能够更加迅速地对市场趋势和顾客需求作出反应，节省库存费用，还能够引领技术创新驱动的全球化新方向：制鞋业在新技术条件下，已经不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此相关，2017年的国际舆论中不乏“机器人

革命让制鞋业重回德国”“机器人崛起施压（中国）世界工厂”等声音，自然也引起了国内舆论的焦虑。然而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阿迪达斯的“快速工厂”高开低走，2019年11月宣告结束，德国和美国的工厂最迟于2020年4月关闭，“快速工厂”的技术将在阿迪达斯在中国和越南的供应商处投入使用。换句话说，试图从中国和亚洲移走的供应链又回到了中国和亚洲。

这个例子比新冠疫情下的“脱钩论”和“撤资论”更能说明全球化的规律。除了政治化、情绪化的话语与企业的实际运转脱节以外，所谓创新驱动的全球化转型看来也不可能在所有行业、所有领域一蹴而就。即使这种转型是某些行业的未来趋势，那也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的各个参与方都可以适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当然，目前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变本加厉的“去全球化”以及“与中国脱钩”等做法，也让德国政府和经济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德国目前最大的担心之一，就是在日益激烈的中美竞争下被边缘化。

正视经济和全球化的规律，而不是把某些政治聒噪、虚假话语当作既成事实，才能帮助我们在新冠疫情的挑战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抓住了这个视角，才能看清中德两国一如既往的合作才是这个失范的世界中的中流砥柱。中德总理6月11日的视频会晤、默克尔总理5月27日在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活动上的讲话，都表明了制度的差异不应该成为反对交流、对话和合作的理由。我们有理由期待，理性、务实的和中德两国在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能在双边和全球合作上迈出更为坚实的前进步伐。

## 默克尔会打开欧洲从联盟走向联邦之门吗？

### 默克尔的魄力

“She did it!”——“她真这么做了！”这是欧洲政治和政策新闻机构POLITICO专栏撰稿人保罗·泰勒（Paul Taylor）5月19日如此描写默克尔令人难以置信的、突破自我的政治举动。就在前一天，她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携手提出了一份“新冠危机后欧洲经济复苏德法倡议”，内容包括四部分行动建议，其中第一部分“制定欧盟的‘医疗卫生战略’”、第三部分“加速绿色新政和数字化”以及最后一部分“加强欧盟的经济和工业抵抗力和主权，为内部市场注入新动力”等或是针对新冠疫情中所暴露短板的直接反应，或是在欧盟和德法等成员国层面讨论已久的政治议题，很难说有什么突破性的东西。真正让泰勒等政治观察者、欧洲政治家和民众吃惊不已的，是该倡议的第二部分内容，即为了欧盟的经济复苏设立一个“雄心勃勃的基金”。基金规模将高达5000亿欧元，由欧盟向市场贷款筹得，再做入预算提供给受到新冠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领域和地区用于经济复苏。也就是说，德法两国建议复苏基金不是以贷款的形式发放，而是在欧盟预算

的框架内下拨，不需要接受方偿还。

## 欧盟的“汉密尔顿时刻”

敏感的观察者从这种机制设计中读出了深刻的、近乎制度革命性的含义：这不就是欧盟国家集体承担债务吗？作为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上至联邦政府，下至普通民意，在对待欧盟的态度上最为忌讳和反感的就是欧盟从一个由共同理念塑造的政治和经济共同体异化为“债务共同体”。这一点在从2009-2015年的欧元危机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也就是在欧元危机中，德国曾经拒绝把减免债务和发行欧元债券作为纾困手段，而以执行严格的紧缩财政政策作为条件向处于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提供贷款实施救助。2018年，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党代会上还特地明文确定：基民盟永远不会允许欧洲成为一个“转移支付联盟”。基民盟和基社盟内“经济和小企业联盟”甚至提议“坚决拒绝任何债务和担保风险的集体化”，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正是因为这种对于债务近乎道德戒律的执着要求，使得“丑陋的德国人”近年来再度成为南欧国家舆论中的话题。在新冠疫情席卷欧洲的时候，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意大利希望通过欧盟发行“新冠债券”或“欧元债券”，意大利甚至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刊发广告、总理孔特在德国《时代周报》亲自撰文，希望获得德国的理解，却仍旧遭到了后者的坚决拒绝。就在5月初，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还做出判决，欧洲央行购买国家债券的做法“部分违反德国《基本法》”，这对于欧洲央行应对新冠疫情的努力无疑设置了法律的障碍，引起欧洲一片哗然。

与基民盟/基社盟传统的立场相比，这次德法的联合倡议设立复苏基金不可不谓激进之举。南欧国家自然喜出望外，称之为体现欧洲团结的“应有之义”。保罗·泰勒的评论更是赋予了默克尔的转折以历史性的深度：“在自己总理生涯行将结束的时候，默克尔同意欧盟集体举债，以帮助受到新冠危机打击最为严重的国家重建经济，这使她在欧洲政治伟人的圣殿中拥有了一席之地。”不少舆论视德法倡议为欧盟历史的“标志性的时刻”，类似于美国首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18世纪末通过把联邦州的债务联邦化以打造美国。欧元集团主席、葡萄牙财政部长马里奥·森泰诺（Mario Centeno）对汉堡《星期日世界报》说，即使复苏基金是有限期的，德法联合的建议也可能是欧盟走向财政联盟和真正能够运转的货币联盟的一大步。众所周知，一个具有财政联盟特点的欧盟将是欧洲迈向“欧洲联邦”的最重要一步，也是欧盟克服其结构性缺陷的关键手段。

## 默克尔的转折与欧洲的领导力量

基民盟/基社盟内部没有就默克尔与马克龙倡议的复苏基金发生激烈的内部争论，就连在欧元危机中立场最为“古板”的时任财政部长、现任德国联邦议院议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也表达了赞同，这让国外的观察者多多少少有些意外。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默

克尔和基民盟/基社盟在欧洲共同债务问题上转换了立场？

这次新冠疫情对于欧洲经济和社会秩序冲击之深重，以及重大危机更加呼唤欧洲的团结，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除了意大利、法国等国家遭受的公共卫生危机和人道灾难之外，各国失业人数剧增，欧盟委员会预测欧元区经济将在今年萎缩 7.7%，明年也无法完全恢复，这是一个自上世纪 20 年代末大衰退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经济冲击，欧洲人普遍意识到必须采取前所未有的恢复和刺激手段。欧盟的历史表明，欧盟一体化前进的动力都源自针对危机的回应。面对“几代人一遇”的新冠危机，德国最终选择了欧洲互助和团结。这也许是默克尔继欧元危机和难民危机之后，再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展现危急时刻的决断力，虽然每一次应对措施都引发德国国内的巨大争议。

其次，法国人此次做足了前期准备工作。法德是欧盟的火车头，法国总统马克龙几年来一直呼吁深化欧盟一体化，但是未能获得德国正面回应。按照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6 月 12 日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的说法，法国人从不怀疑德国人可以改变立场，也承认德国人不愿意为他国承担旧债的合理性，所以法国人决定在谈判时不能步伐迈得太大，而且要避免一切能够触动德国敏感神经的字眼如“欧元债券”“新冠债券”等，大家需要的是一个新机制。勒梅尔钦佩默克尔克服国内成见的勇气，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提出了关键的建议：把需要的资金放在数年的欧盟预算框架内。这是一个精妙的建议，说服了很多犹豫不决的国家。而且按照基民盟联邦议院党团主席拉尔夫·布林克豪斯（Ralph Brinkhaus）的解读，复苏基金虽然可以通过市场筹得，但是每个成员国都只担保自己国家负责的部分，而不是像“欧元债券”的设计需要为全部债务提供担保。

德国，终于在欧洲需要领导力量的时候抛下了过往的包袱，真正成为了欧洲的领导力量。

## 德法倡议的未来

5 月 27 日，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德法倡议的基础上，向欧洲议会提出了 7500 亿欧元的复苏基金方案，其中 5000 亿欧元以无须偿还的直接补贴形式、2500 亿以优惠贷款的形式提供给成员国使用。基金来源于欧盟在资金市场上获得的贷款，共同通过欧盟预算还款。冯德莱恩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克服新冠危机，而克服危机需要进行史无前例的投资，“直到下一代人还能够从中得益”。

欧盟的预算方案需要 27 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通过，而德法的倡议、欧盟委员会的预算案仅仅是讨论的基础。以奥地利为首的“节俭四国”（指的是奥地利、荷兰、丹麦和瑞典）则坚持了一贯的财政自律立场，反对德法倡议的核心部分即复苏基金以补贴的形式直接发放到受助国，

而坚持作为贷款有借有还，提高欧盟预算的份额也不在考虑之列。东欧国家能否同意以德法倡议为基础的纾困方案，也存在不确定因素。

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预算和复苏基金的方案最早能够在7月上旬得出答案。无论协商结果如何，欧盟集体举债已经不再是禁忌话题。新冠疫情引发的危机，也许能够意外成为欧盟深化一体化的推手。

##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0年5月25日~6月10日）

5月25日 德国中小企业因为新冠疫情面临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衰退。德国经济部公布了一项针对中小企业的援助计划。该提案旨在帮助企业支付6-12月期间的固定成本。每月援助最多可达5万欧元。

5月26日 德国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达成协议，将防控新冠疫情的社交限制措施延长至6月29日。

5月27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虽然新增确诊病例在不断减少，但德国“目前既无疫苗，也无有效药物，仍处在疫情初期”，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需要继续密切协调。尽管各州政府在抗疫诸多领域有自主决定权，但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在共同抗疫方面应该始终保持一致，这也是德国抗疫措施迄今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

5月28日 德国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发布报告预测，德国经济今年或将萎缩6.6%，2021年将在这种“低水平”基础上增长10.2%。报告预测，今年第二季度，德国经济将降幅可达12.4%。

- 中国是大众汽车最重要的销售市场。大众汽车集团正与江淮汽车母公司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谈判，计划以至少70亿人民币收购江淮控股50%的股权。另外，大众还在努力推进对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国轩高科的收购，有意争得最大股东席位。

5月30日 鉴于当前新冠疫情，德国总理默克尔不会前往美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默克尔同时也会持续关注疫情发展，以重新评估形势。

6月3日 经过两天累计21小时磋商，德国执政联盟就总计13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方案达成一致，其中1200亿欧元由联邦政府负担。执政联盟决定“大胆应对”疫情所致冲击，提振消费、增加创新投资并帮助缓解家庭面临的资金压力。依据这一方案，从7月1日开始，增值税从19%下调至16%，低税率增值税从7%下调至5%，持续6个月。这部分减税预计总计200亿欧元。

- 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这是中德双发源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第三次通话，体现了双方的高度政治互信和密切战略沟通
- 德国政府将从6月15日起取消针对欧盟除西班牙外其他成员国，以及英国、冰岛、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旅行警告。德国外长马斯在会后表示，旅行警告将由针对个别国家的旅行建议取代。针对欧洲之外国家和地区的旅行警告仍然有效。如果某个国家或地区一周内平均每10万居民中出现50个新增感染者，旅行警告将重启。
- 德国联邦劳工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5月份德国失业人数环比增加23.8万人至287.5万人，但较4月有所收窄。德国迄今没有出现大规模裁员潮，大量企业将继续实行短时工作制。今年3月和4月，德国有超过1000万人申请短时工作。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德国仅有330万人申请短时工作。

6月4日 柏林市议会通过一项新法案，旨在更好地遏止系统性种族歧视。柏林市是德国第一个专门就反对种族歧视通过法案的联邦州级行政单位。这项法案明确禁止警察以及其他公共部门人员因肤色、性别、宗教信仰、语言能力等区别对待公众，受歧视人员有权申请赔偿，公共部门可以申辩。

- 对在建的北溪二线管道实施制裁的草案已被提交美国参议院，法案制定者建议针对向北溪天然气管道二线项目所使用船舶提供服务的保险公司实施制裁。

6月5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大规模削减美国在德国的驻军人数。德国外长马斯表示：“德美跨大西洋联盟的亲密伙伴。但是这个关系十分复杂。”马斯同时提醒美国，从在德国驻军中获益的不仅仅有德国，也有美国自己。

- 疫情爆发导致汉莎业务锐减，市值大跌，汉莎航空被德国证券交易所排除出DAX指数。德国证券交易所每年进行4次评估，调整进入DAX指数的30家蓝筹企业。德国居住房产公司（Deutsche Wohnen）将成为该指数榜单新军。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20年6月10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胡春春**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mailto:dgyj@tongji.edu.cn)**